

# “阿米尼乌预定论之争”对于加尔文主义信仰的意义

董江阳

---

上帝预定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性张力，并构成了基督教思想史上一个广泛持久的探讨论题。基督教教义与神学在其历史与逻辑推演中，围绕这一核心问题逐步凝结成所谓的“阿米尼乌主义之争”。本文分析了阿米尼乌主义在教会史与系统神学里的地位与处理方式，指出了这场争论起因与要旨就在于因不同圣经解读而导致的对于预定对象与自由意志的不同理解，勾勒了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的兴起以及对现代福音派信仰的影响，判定阿米尼乌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构成了“宗教改革”的一种后续发展，认为它作为加尔文系新教改革宗内部的重要神学分支，几乎一直伴随基督教新教这五个世纪的发展，并对丰富和深化基督教新教信仰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预定 自由意志 阿米尼乌主义 加尔文主义 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

作者 董江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

## 一、作为宗教改革后续发展的阿米尼乌主义

有人说，“亚塔纳修懂得上帝，奥古斯丁懂得人，阿米尼乌懂得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sup>①</sup>詹姆斯·阿米尼乌（James Arminius，约1559-1609年），是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的一位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宗教改革是一场持续发展的历史运动。从宽泛的历史时期划分上看，他属于一名“宗教改革者。”具体地，如果把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看作第一代宗教改革者，把加尔文的继承人西奥多·伯撒（Theodore Beza，1519-1605年）看作第二代宗教改革者，那么作为伯撒学生的阿米尼乌则属于第三代宗教改革者了。

阿米尼乌神学代表着那个时代基督教新教神学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温和或修正形式的加尔文主义代表，阿米尼乌与严格或极端加尔文主义围绕预定论发生了神学冲突。预定论是涉及基督教救赎论的一个核心教义，专指上帝经由基督而对人实施救赎的神圣旨意与安排。那些涉及上帝、人以及救赎等信仰根本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预定问题加以展开的。如何理解上帝的预定，左右着人们对于救赎、永罚、恩典以及自由意志等问题的理解。上帝的预定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性张力，由此构成了基督教思想史上一个广泛持久的探讨论题。基督教教义与神学在其历史与逻辑推演中，围绕这一核心问题逐步凝结成所谓的“阿米尼乌主义之争”。

阿米尼乌在莱顿大学执教期间，与戈马鲁斯（Francis Gomarus）等人的争论的影响开始波及

---

<sup>①</sup> Cited from Carl Bangs, *Arminius: A Study in the Dutch Reformation*. Abingdon Press, 1971, p. 18.

整个荷兰。阿米尼乌本人虽然在这场争论渐趋高潮时因病去世，但围绕阿米尼乌神学所形成的教义争论，却使整个荷兰都深深陷于“抗辩派”与“反抗辩派”的神学之争并几乎濒临内战边缘。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 1618 - 1619年）之后，阿米尼乌主义又在新教世界获得进一步演化与流变。一直到今天，几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非路德系的基督教新教，在某种意义上都因此而区分成了所谓“加尔文派”与“阿米尼乌派”。

## 二、阿米尼乌主义之争的要旨

上帝预定问题，就是上帝拣选某些人救赎、弃绝某些人毁灭的问题。主张上帝拣选某些人救赎同时弃绝某些人毁灭的为双重预定论；仅仅主张上帝拣选某些人救赎的为单重预定论；单重预定论只不过是双重预定论的弱化和变异形式。极端预定论认为，上帝在不考虑人的正义或罪恶、顺从或不顺从情形下，完全出于自己的喜好，以一种永恒和不变的命令，预先决定了某些人会获得永生，而其余的人则会走向永恒的毁灭，以彰明自己的公义与荣耀。极端预定论者认为这种神学教义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在这些观点之上，确立了一切信仰者确凿无疑的慰藉，这能使他们的良心保持平静与安宁；在这些观点之上，还确立了对上帝恩典的赞美，以至于对这一教义提出任何反驳，都必定会褫夺上帝恩典的荣耀，并将救赎功绩归功于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自身的能力——而这样的归功于也就带有了贝拉基主义的味道。”<sup>①</sup>这种极端形式的预定论就像任何极端事物一样，也必定面临着自身内在逻辑推演所可能形成的矛盾。事实上，按照这种极端预定论，就有可能推导出“上帝是罪的作者”这样一种危及基督教核心信仰的荒唐结论。

这场争论的由来，简言之，是由两处圣经经文释义所引发的神学问题。围绕着《罗马书》第七章所引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当时当下的他自己吗？换言之，他是以自己的名义在谈论一个已经领有基督恩典的人呢，还是以第一人称形式在扮演或假装一个处在律法之下的人呢？此前教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采取了含混态度。但“宗教改革”后，随着新教正统教义的确立以及新教“经院哲学”的发展，一些极端加尔文派在这一问题上逐渐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态度，并将对立看法斥之为异端。然而在质疑者看来，如果认为使徒在本章尤其第14节至第25节所说的是一个已经重生了的人，而这个重生过的人还仍然被罪恶所主宰，只是慕善而不行善，那么所有对虔敬的关注、整个新成就的顺从以及整个新的创造，都将仅仅局限为一种主观的情感而不会导致实际的结果。这将会极大地贬低重生恩典的价值，并降低对虔敬的热忱与关注。阿米尼乌对“罗马书”第七章的解释认为，保罗谈论的内心挣扎是一种皈依前而非皈依后的挣扎。使徒在此所说的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已经重生过了的人，而是一个站在重生边缘或门槛上的人，亦即即将重生但还尚未重生的人。阿米尼乌并不否认，罪亦存在于重生者那里，但他认为罪对于重生者和未重生者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他看来，经过更新或重生的人与没有经过更新或重生的人有着本质区别。在与罪的交战中，如果赋予恩典的力量过于微弱，不仅是对上帝恩典的贬低，而且也是对重生者德性积极性的一种挫伤与打击。

相应地，阿米尼乌对“罗马书”第九章的解释认为，此处经文中提到的雅各和以扫，所指的并不是两个个体人而是两类人。阿米尼乌的圣经解释强调，预定的对象并不是自然状态的人而是堕落了的人，不是个体性的人而是群体性的人亦即组成了教会的信仰者。所以，上帝对人救赎的预定，就是堕落了的人，经由基督福音的宣扬，通过悔改和认信，而在中介者耶稣基督里与上帝的和解。

关于人的自由意志问题，阿米尼乌与极端预定论者的分歧不是恩典的重要性问题，而是恩典

<sup>①</sup> *The Works of James Arminius*, London ed., Baker Books, 1986, vol. 1, p. 617.

运作的模态问题，亦即，恩典是否是不可抗拒的。阿米尼乌认为，自由意志的自由是指免于必然性的自由。但是免于“必然性”的自由，并不是指免于“罪”的自由。人没有免于“罪”的“自由意志”，因此也没有朝向“灵性善”的意志或能力。人的自由意志处在罪的束缚下，需要有来自人之外的救赎；而唯有上帝能够提供那种救赎。上帝的救赎并不需要人的自由意志作为其辅助或支持。人对上帝所有的回应都是出自上帝恩典的事工。上帝对罪人恩典性救赎的结果之一，就是人在信仰中的“合作”。这里的“合作”不是更新或重生的手段，也不是辅助性或次要性的手段，而是更新或重生的“结果”。那么，上帝恩典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吗？阿米尼乌认为，恩典并不是一种力量，而是一个“位格”或“人格”，亦即圣灵。在人格关系中，并不存在一个位格被另一个位格完全压倒的情形。阿米尼乌相信，有许多人抗拒了圣灵，拒绝了那提供给他们恩典，所以上帝恩典并不是不可抗拒的。<sup>①</sup>

### 三、阿米尼乌主义在教会史和神学体系里的境遇

上帝与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是一个永久问题。宗教改革以前，奥古斯丁是教会史上第一个明确的预定论者，他持有一种相对温和的双重预定论。在与贝拉基的教义争论中，虽然奥古斯丁最终战胜了贝拉基，但罗马教会却在随后发展中并未真正接受奥古斯丁的观点，而是采取了一种间接或部分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准贝拉基主义。罗马天主教在坚持上帝特殊神启之外，还肯定了自然启示的存在，并认为堕落的人仍保存有与辅助性恩典合作的微弱能力，并以其自然能力行使其意愿。而且，罗马天主教在肯定上帝拣选的同时并没有进而明确上帝的弃绝。它认为被弃绝者遭受永罚，不是出于上帝的命令，而是因为他们对上帝恩典的抗拒或不信仰。相应地，托马斯·阿奎那亦将预定看作上帝神佑论（divine providence）的一个特定方面，他没有在其无所不包的神学体系里详述上帝预定这一问题。

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在肯定神圣恩典之神治的过程中，在逻辑上允许其采取一种双重预定的形式。不过他有意识回避了所谓弃绝问题，而采纳了某种经过修订的单重预定论。与加尔文从上帝神治（sovereignty）出发不同，路德神学的出发点是人在上帝面前的称义问题。路德担心如果过于强调预定就有可能削弱人的因信称义教义。所以，路德并未在上帝预定问题上进行过多纠缠，而是以尊敬神圣意志的奥秘为由，告诫人们应当在预定问题上保持沉默。路德曾为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与伊拉斯谟进行过争论。菲利普·梅兰希顿试图在意志自由问题上调和他们两人的对立立场，但未获成功。但梅兰希顿却在争论中逐渐靠近了伊拉斯谟的立场。梅兰希顿坚信，“在那些皈依了的人之内必定有某种东西，将他们与那些拒绝皈依的人区分开来了。在后来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罗列中，梅兰希顿为这种皈依确定了三个原因——道，圣灵以及认同而不是抗拒上帝之道的人之意志”。<sup>②</sup>

加尔文采取了与路德类似的立场。加尔文更进一步认为，圣经已经对上帝预定做出了明确启示，人们可以据此提出一种系统的预定论。不过，预定教义在加尔文神学体系里并不具有首要地位，它不是决定了加尔文的神学体系而是被整合在了那个体系之中。“预定是加尔文体系里的一种核心教义，但它并不是首要性的。它是其上帝神治教义的派生物。”<sup>③</sup>而且，加尔文与奥古斯丁一样更乐意谈论拣选而不是弃绝问题，因为弃绝构成了预定教义的阴暗面。

① Cf. *The Works of James Arminius*. London ed., Baker Books, 1986, vol. 2, p. 721.

②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5 vol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1991, vol. 4, pp. 143-144.

③ Alan P. F. Sell, *The Great Debate: Calvinism, Arminianism and Salvation*. Wipf & Stock Publishers, 1998, p. 3.

就以堕落前预定论为代表的极端预定论而言，并不能肯定加尔文本人会赞同这一主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加尔文之前并没有人明确坚持过这一论点。一般认为它是加尔文追随者的晚近发明。譬如伯撒在坚持加尔文教导的同时，通过对加尔文预定教义的片面强调，以及对这些教义过于具体化和明确化的解读，使他所坚持的那种类型的加尔文主义，成为了当时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滥觞。伯撒就认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后半部分提到的那个人是重生了的人，而在《罗马书》第九章里提到的“一团泥”则是指还尚未创世之前的人。由此，伯撒提出了一种不仅是堕落前而且还是创世前的极端预定论。<sup>①</sup> 这种看法不仅简单化和片面呈现了加尔文的相关见解，而且也与后来阿米尼乌对这两段关键经文的解说形成了直接对立。有当代学者把伯撒对加尔文的这样一种发展，归结为因“继承者”对“被继承者”或者“二世”对“一世”过度忠诚热心而产生的一种常见症结“在伯撒那里，阿米尼乌将要直面的是一种派生性的加尔文主义，不是导师自己的，而是一位追随者的；这个追随者试图通过为原本是一种自由与创造性的神学，强加一种严格的内在一致性，来忠实于他的导师。也许，伯撒说的任何事情都能在加尔文那里找到出处，但重心不一样了。伯撒将预定论提升到了一种它在加尔文那里所不具备的突出地位。对伯撒来说，以其自身为目的的预定变成了神圣意志的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奥秘。”<sup>②</sup>

从更广泛神学教义范围看，这场教义之争源于带有普遍性的上帝神佑论与带有特殊性的基督论之间所存在的持续张力。单从教义内容上看，极端预定论把传统上隶属于上帝神佑论的部分内容与特性转移到了上帝预定论中，并被看成是上帝预定范围之内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极端预定论存在将上帝神佑与上帝预定合而为一的倾向。在注意到这种不当倾向后，阿米尼乌特别留意上帝神佑与上帝预定之间的界限，同时还明确了神佑是上帝论的一个概念，而预定则是救赎论中的范畴。总之，阿米尼乌理解的预定其实属于有条件的预定，它建立在上帝对人接纳还是拒绝福音的预知基础上。它对上帝拣选与弃绝的理解是以基督福音为中心的。在上帝三一一体里，上帝的第二位格而不是第一位格，成为阿米尼乌思考上帝属性及其与人之关系的核心。在重新诠释预定教义后，阿米尼乌还进一步对上帝的恩典，对基督的赎罪性质与范围，对圣灵的更新与圣洁作用，以及对福音宣教的意义等一系列教义进行了调整或重新界定，从而完成了所谓的阿米尼乌神学范式转变。

#### 四、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的兴起

新教改革宗历史上，多特会议是唯一一次具有“准普世性”特征的宗教会议。大会制定并通过的信仰教典，构成了17世纪加尔文主义的经典表述。它虽然通过了对于阿米尼乌主义“五条抗辩”的否定性评判，但亦拒绝了戈马鲁斯的堕落前预定论这一最极端教义，并修订了加尔文和伯撒的某些僵化逻辑，而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表述形式：拣选是上帝从堕落之人中的选择，而弃绝则是人自我堕落状态的自然后果。<sup>③</sup> 后人将多特会议五条教典之简要标题的首字母组合在一起，就形式了一个既具有字面含义又具有荷兰特色的单词。这就是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的神学“郁金香”(TULIP)：T-total depravity (完全腐败)；U-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拣选)；L-limited atonement (有限赎罪)；I-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P-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忍耐持守)。

① Cf. Theodore Beza, *A Little Book of Christian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Trans. by Kirk M. Summers. Wipf & Stock Publishers, 1986, p. 84.

② Carl Bang, *Arminius: A Study in the Dutch Reformation*. Abingdon Press, 1971, p. 66.

③ Cf. John L. Girardeau, *Calvinism and Evangelical Arminianism*, The Baker & Taylor Co., 1890, pp. 9-11.

不过,阿米尼乌思想中蕴含着多向发展的潜在可能。阿米尼乌主义既能够成为正统信仰的改良者与颠覆者,也能够成为正统信仰的支持者与维护者。面对极端加尔文主义,它对“唯有恩典”(sola gratia)这一宗教改革精髓的过度强调作出了谨慎校正;另一方面它又对“唯有圣经”(sola scriptura)这一宗教改革精髓的不当贬抑作出了坚定维护。随着逻辑与历史的推演,阿米尼乌主义分化成了两大类,一类强调宗教与信仰的宽容、自由与理性,另一类则强调人对恩典的回应能力;前者属于“头脑的”阿米尼乌主义并走向了自由主义,后者属于“心灵的”阿米尼乌主义并走向了福音派奋兴主义。正是由于这二重特性,使得阿米尼乌主义在出现数世纪后,仍然既无法被完全同化也无法被完全拒斥。阿米尼乌主义在荷兰“抗辩派”教会和英国“高教派”及“广教派”教会里的后续发展,似乎成了一个逐步被证实为异端的过程。但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Evangelical Arminianism),特别是卫斯理式阿米尼乌主义(Wesleyan Arminianism)的出现,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sup>①</sup>

阿米尼乌看重经圣灵更新对于罪人的意义,主张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是为所有人而不是仅限于拣选者,并坚持人在恩典里对神圣恩典回应的责任与能力。这些主张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年)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悔改、认信、圣洁和成圣构成了卫斯理神学的核心。自视为阿米尼乌派的卫斯理以普遍恩典论取代了拣选预定论。“按照这种阿米尼乌形式,上帝对于世界的意志,是一种救赎的普遍意志。这一断言本身,在18世纪卫理公会信仰兴起以前,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教会教义。”<sup>②</sup>根据普遍恩典论,上帝的救赎福音与恩典是提供给所有人的,并使所有悔改和认信基督的人都有可能得救。极端预定论否定了人的自由选择,一些人接纳恩典只是因为自己是拣选者,而其余的人没有接纳恩典也只是因为自己是非拣选者,这不仅抹杀了人的自由性与能动性,而且也使上帝成为罪与不公的作者,并与上帝爱的本质属性相矛盾。<sup>③</sup>可以说,卫斯理以普遍恩典与福音宣教为重心的阿米尼乌主义是自成一派的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有研究者总结道,“卫斯理阿米尼乌主义是通过圣公会中介给他的。阿米尼乌的基本观念传递过来了,但却带上了一种鲜明的英国口音。卫理公会信徒将他们自己称作阿米尼乌派,但他们不过是阿米尼乌的远亲而非直系后裔。”<sup>④</sup>

这样,阿米尼乌主义的主体发展还是在于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分支。在主张普遍救赎与自由意志之外,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由于注重基督中心论、灵性皈依、圣洁生活和福音传教,而在神学与教会两个层面上获得了迅猛发展。它以其强劲的神学与教会发展而跻身基督教主流之列,并逐步构成了传统与保守基督教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卫斯理等人领导的圣洁与福音运动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以至于“自从卫斯理以后,我们全都是阿米尼乌派了”。<sup>⑤</sup>受其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些保守派基督教运动,譬如现代福音派、无旬节派、灵恩运动、圣洁教会等,在神学思想上大都具有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特征。一些福音派神学家譬如C. S. 刘易斯和克拉克·平诺克,一些大众福音布道家譬如司布真、芬尼、穆迪、桑戴和葛培理,亦都具有明显的福音派阿米尼乌主

① Cf. David Bebbington,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 Baker Books, 1989, p. 27.

②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5 vol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1991, vol. 4, p. 235.

③ Cf.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Frank Baker ed., Clarendon & Abingdon, 1975-1996, vol. 10, pp. 284-298; 358-363.

④ L. L. Keefer, Jr., “Characteristics of Wesley’s Arminianism,” in *Wesleyan Theological Journal*, vol. 22, no. 1, Spring 1987, p. 90.

⑤ G. F. Nuttall, “The Influence of Arminianism in England,” in Gerald O. McCulloh (ed.), *Man’s Faith and Freedom: The Theological Influence of Jacobus Arminius*. Abington Press, 1962, p. 46.

义特征。

许多情形下，大众福音布道家的阿米尼乌主义特征似乎是天生就具有的神学倾向。通过将人的决定置于救赎核心，阿米尼乌主义迎合了时代精神与文化并提供了现代福音派所需要的：一种将个人选择作为关键性因素的福音。譬如葛培理对尚未皈依者经常发出的信息就是：你关闭了自己的心灵之门；耶稣正在敲响你的心灵之门；耶稣说“我想要进来，想要宽恕你，想要赋予你永生”；但耶稣永远不会强行推开那扇门；你必须打开那扇门；你愿意将心灵之门为基督打开吗？按照这种说法，在个人重生上，圣灵不论怎样激发、吸引和爱一个人，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这个人的决定与选择。所以，有批评者指出“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尽管有一些显著例外，但是保守的福音派大都倾向于阿米尼乌一方。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福音传教这一战略需求的影响：基督为所有人而死，并呼召所有人皈依他，但他们必须做出决定来接受他；如若他们不接受他那就是拒绝了他。上帝不是自动救赎，只有当福音被宣告并被接纳时，才会救赎。”<sup>①</sup>当代福音派认为基督是为所有人而死，并呼召人们认信基督。所以人们必须要做出抉择以接纳基督；如若没有接纳基督，那么就是做出了拒绝；而人的自我抉择就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尽管这里所谓的自由意志是处在恩典之下并经过圣灵更新了自由意志。所有这些现象都从侧面印证了阿米尼乌主义自身具有的但却是隐秘性的准贝拉基主义倾向。所以有当代学者不无理由地抱怨道，在当今福音派基督徒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准贝拉基主义或阿米尼乌主义。<sup>②</sup>

自19世纪后期以来，加尔文主义与阿米尼乌主义之间的传统神学争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传统加尔文派已经很少宣扬和强调双重预定的极端预定论了，在阿米尼乌派这个老对手之外，又兴起了更为强劲的神学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基督教教会内外的神学兴趣，也从此前高度关注的预定教义、称义教义和赎罪教义转移到了“道成肉身”教义上。相应地，有关预定论的争论逐渐趋于平缓低调。

## 五、作为加尔文主义改革宗内部的一场神学争论

“上帝神治”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两者之间的神秘关联及紧张关系，历来都是摆在基督教神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论题。阿米尼乌主义就是对这一论题的正面回应。阿米尼乌主义几乎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基督教新教这五个世纪的发展。它作为加尔文系新教改革宗内部的重要神学分支，对于丰富和深化基督教新教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与严格加尔文主义存在分歧，但阿米尼乌主义作为植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种新教改革宗神学，属于当今福音派神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米尼乌坚持，加尔文本人并不是一个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而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在神学教义上为了防止一种极端却陷入了另一种极端，为了防止贝拉基主义却让自己陷入了决定论的泥沼。对极端加尔文主义不满的阿米尼乌或卫斯理等人，同时亦对教会史上公认的异端贝拉基主义保持着清醒认识。他们不满于极端加尔文主义，但同时亦认定贝拉基主义为异端。由于这种不满，也由于这种警觉，使得他们只能通过其他方式为自由意志争取一定的能动与责任性，使其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在人的救赎中发挥某种“能动”效应或“合作”责任。救赎无疑完全是由上帝赐予的，但人至少还有接纳或利用它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讲，不论阿米尼乌强调的“处在恩

<sup>①</sup> James Barr, *Fundamentalism*, SCM Press Ltd., London, 1977, p. 188.

<sup>②</sup> Cf. J. I. Packer, "Introduction," in Martin Luther,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Trans. by J. I. Packer & O. R. Johnston. Fleming H. Revell, 1957, pp. 58 - 59.

典里的人之自由意志”，还是卫斯理提出的“先在的恩典”，都不过是在形式上否认自己为贝拉基主义的同时，实质上通过另一种形式的准贝拉基主义来赋予人的意志以某种能动责任性，使其能够在原罪、自由意志与救赎等教义问题上，行走在加尔文主义与贝拉基主义的夹缝之间。但无论如何，传统教会反对贝拉基主义异端的立场，还是有效约束与制约了这些从严格加尔文主义那里反叛出来的神学与教义。

总之，阿米尼乌坚持的并非预定论的“预定论”其实属于有条件的“预定论”。它建立在上帝对个体人接纳还是拒绝福音的预知基础上。亦可将其称之为群体或类别“预定论”，亦即上帝预定获得救赎的是一类人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是对悔改与认信的信仰者群体之救赎的“预定”。在阿米尼乌看来，“神圣命令本身，作为上帝一种内在行为，并不是事物的直接因”。<sup>①</sup>假如让加尔文本人来评判阿米尼乌主义的话，他很可能不会认同阿米尼乌对于无条件拣选教义的批判，但是对于阿米尼乌所持的救赎范围看法也许不会表现出那么坚定的反对。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指出，“加尔文主义代表着一贯的、逻辑的和保守的正统信仰；阿米尼乌主义则是一种弹性的、开明的和变化着的自由主义。加尔文主义在多特会议上取得了胜利，并驱逐了阿米尼乌主义。类似地，在前一代人那里，严格路德主义也在‘协同信条’上，取得了对于梅兰希顿主义的胜利。但在这两大教会里，被征服一方的精神，却在正统信仰范围内一再浮现，并发挥着调节和解放性的影响，或者是在神学前进过程中提出了新问题。”<sup>②</sup>

阿米尼乌主义同样坚持上帝通过其神佑而统治并看顾世界万物；人是完全腐败了的罪人，在其自然状态下甚至都没有能力接受上帝恩典的供应；救赎完全有赖于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通过任何事工；上帝对其受造物的永恒计划必定会实现等等。但阿米尼乌主义认为上帝恩典与救赎是普遍的，人的获救需要人在上帝恩典里对神圣救赎做出回应。在救赎论上，阿米尼乌派与加尔文派亦有许多共同之处：都主张经由信仰通过恩典而获救赎；因信仰而称义，被接纳，与基督共融；成圣是称义和与基督融合的外延事工；所有真正信徒完全和最终的救赎即荣耀，等等。不论如何，上帝与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宗教信仰中最为重大的问题，也是最为难以索解的奥秘和最终的启示。基督教教会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持久的探讨和争论，并在新教世界里最终则演化成加尔文主义与阿米尼乌主义这两大分支。阿米尼乌主义尽管是对改革宗新教正统的一种挑战，但这种挑战本身仍然属于新教改革宗这一阵营，属于改革宗新教信仰范畴。总之，这场争论是属于基督新教改革宗内部的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神学教义争论，它发展、丰富和完善了基督教加尔文主义信仰。

阿米尼乌主义与加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一对欢喜冤家，它们两者的相反相成组成了一个有机共生统一体。其历史意义通过反省下面几种假设情形，可以得到更明确的呈现：假如没有早期贝拉基主义异端的历史警醒，阿米尼乌主义还能够恪守信仰正统吗？答案是“不能”。假如阿米尼乌主义在争论中获胜，它能够避免陷于神学异端吗？答案是“不能”。假如没有阿米尼乌或卫斯理，严格预定论也能受到类似挑战或质疑吗？答案是“能”。假如没有阿米尼乌主义之争，加尔文主义神学还能保持信仰正统性吗？答案是“不能”。假如当代加尔文主义信仰完全忽略或遗忘阿米尼乌主义的挑战，它能够继续保持其信仰正统性与活力吗？答案是“不能”。总之，阿米尼乌主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一、矫正并确保了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走向；二、培育和发展的卫斯理式或福音派式的福音主义；三、激励和推动了基督教新教现代福音宣教运动的兴起。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The Works of James Arminius*, London ed., Baker Books, 1986, vol. 1, p. 752.

② Schaff, Philip (ed.),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With a History and Critical Notes*. 3 vols. 6th ed. Baker Books, reprinted 1998 from the 1931 edition, vol. I, p. 509.